

导言 日本的经济思想和 西方的经济思想

在开始研究日本经济思想的演进过程之前，让我们思考一下竹内启这位对于当代经济思想颇具洞察力的分析家的一段中肯的话吧！

“我们在谈论日本经济学时，当然不是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学不同的某种日本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是不存在的，试图创立这样的经济学也是毫无意义的。”^①

确实，有些作家曾试图阐明日本人甚至亚洲人的经济传统所固有的历史特征。就在时隔不久以前，一位美国研究者仍似乎有意将西方的经济思想与东方的经济思想加以对比，而后者是以迥然不同于西方的逻辑概念为基础的。^②

日本的研究者有时也看出日本和西方的经济思想是不相连续的，尽管他们在把本国的传统与其他东方国家的传统加以区分上更为认真。例如山崎益吉指出，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儒家学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真正意义的日本经济学，然而大多数西方研究日本

^① 竹内启：《“日本的经济学”——有效性的回复》载《世界》2月号1987年第39页。

^② E. Stuart Kirby: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Economics in the Ori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6(3) 第417页, 1952年

的人或赞赏日本的人却几乎没有接触过这些文献。^①

但是，在日本同西方思想的比较中，西方常常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对照——或是天堂或是地狱（要根据作者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定）——被用来非难或赞赏日本现存事物的状态。这样，对抱有民族主义看法的日本人来说，西方的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提供了一个与他们的民族精神和社会凝聚力恰好相反的事实；而另一方面，某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日本人则认为西方文明更具有利他主义和个人责任感的特征，并用这些特征将他们认为的日本文化所固有的缺点即狭隘的、物质主义的民族主义凸显出来。^② 在本书中我并不想从日本经济思想中引出特定的主题和本质。相反，我试图采用一种在某些方面与中村元在其令人深思的《比较思想史》一书中所确立的宗教学方法相类似的探讨经济学的方法。如中村元所指出的：

“人在生活中差不多面临同样的问题 并已证明对这些问题有相似的对应方法。在某些情形下可以比较的是人生观或对应人生的方法 在某种传统中是少数人的观点 而在另一种传统下或许是多数人的观点。因而或许可以认为‘自助’的教义所表示的宗教对应则在佛教传统中比在基督教中更普遍 接受神赐 他助 的教义所表示的对应则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更普遍。然而，无论是自助还是他助的对应方法在每一种传统中都可以看到，两者的对应关系中含有紧张关系 是偏重于自助还是偏重于他助 起因于遇到困难时

① 山崎益吉：《日本经济思想史》高文堂出版，1981年，第190页。

② 参见森嶋通夫：*Why Has Japan "Succeed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的不同状况。^①

换言之，宗教履行了许多社会基本职能，如提供安慰、激励、确立伦理规范、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等，有时也使社会上的不同意见正当化——但这些职能的重要性及其表现方式则因时因地而异。同样，我们可以说经济思想在现代社会起着各种不同的重要作用，比如它们会对通货膨胀或失业这类具体的复杂现象作出解释，或在更高的层次上为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的整体制度提供首尾一贯的模型，这些模型或有非常实用的目的，用以指导计划拟定者和政策制订者作出决策，或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其逻辑的完美性比实用性更为重要。它们或许旨在展示现存经济秩序的内在协调性和完美性，以使之免于遭受批评，或许试图将公众利益下掩蔽的不公正和剥削加以揭露；它们也可能关注于经济的自然的物质方面（商品和劳务的流量），经济的个人的心理方面（企业家和消费者的动机），或集中在经济的社会结构方面（劳动的供给、财富的分配等）。

在不同国家和历史的不同阶段，这些不同形式的经济思想一再被创造出来。然而它们所具有的相对的重要性是受地域的和暂时的经济环境的影响的。首先，经济思想家提出的疑问和作出的回答明显依赖于他们生活的那个社会的结构和种种问题。确实，如我们在第一章将会看到的，只有当社会和经济制度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时，我们才开始注意到有某种可以称之为“经济思想”的东西出现。

其次，新经济观念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受产生这些思想观念

^① 中村元：*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Kegan Paul, 1986 年，第 475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的知识遗产的限制。经济思想家也像戈纳蒂莱克所说的科学家，通常是目光短浅的，当他（或她）沿着前人建造的地下通道爬行时，只能看到眼前的景象。在这种场合，知识的隧道不仅是由给予思想家启迪的以前的经济理论所建造的，而且也是由伦理学、哲学和科学传统建造的。不管自觉与否，这些传统都对他的思想方式产生了影响。当一个陌生的思想体系从外国传入时（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隧道的结构和方向有可能发生急剧的变化，但是这些外来的思想渐渐地与本国传统的主体相融合。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现在已是日本的知识传统的一部分，正像它构成了英国、美国和苏联的知识传统一样。说得更准确些，日本思想家的知识传统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因为日本的思想家既可以从荻生徂徕的儒学的合理主义、佐藤信渊的激进的国家主义、安藤昌益的无政府主义吸取营养，同样也可以从亚当·斯密、李斯特、蒲鲁东等外国的思想家得到启迪。

最后，经济思想的性质也受经济理论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的影响。在经济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德川时代的儒学者完全不同于明治时代的经济新闻撰稿人或大正时代激进的知识分子，这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的。在 20 世纪，尤其是第二次大战以后的日本，经济学家的作用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经济学家所起的作用也许已没有太大的区别，然而高等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发展使日本得以维持一个数量庞大、其生计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经济学家阶层。

总之，要想给典型的日本经济思想的方法下一个定义是不可能的，但是日本的经济学者对各种经济问题如何用独特的方式作出反应则是可以研究的，这些方式受日本的经济环境、先行的知识

传统、经济学者在日本社会所处的地位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德川时代，日本和西方在处理经济问题上是有显著差异的。当时，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思想交流受到严格的限制。但即便如此，这一时期日本和欧洲对于类似的经济问题产生了同样类似的答案还是令人惊异不已。例如，商业和小工业的兴起，在日本也像在英国那样使思想家们产生了农业是一切财富源泉的见解，而货币经济的传布在这两个地方也导致对货币供给与价格变动之间关系的考察。

19 世纪中叶，随着日本对西方开放门户，分析的焦点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弄清为什么某几种西方经济理论能在日本生根开花而其它的却站不住脚？显然，这里有重要影响力的是日本经济发展自身的性质。在国家对倡导和保护工商企业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经济社会，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不如德国历史学派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具有吸引力是毫不奇怪的。但日本的学术传统在选择过程中也起了作用。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日本“经济”这个概念最初的意义是儒学的“经国济民”即“治理国家和救民于疾苦”这种经济观直到 20 世纪一直影响着日本的思想家，这或许使得日本的经济学者接受作为实证科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特别困难。

不过，在这些思索中，重要的是要防止假定有一种英、美的标准，而日本相对于这个标准是个例外。当我们将日本同英、美的学术史加以比较时，是很容易对 20 世纪前半期的日本新古典派思想衰微而马克思主义增强而感到惊异的。如果把视野扩大，将东欧、南欧以及欠发达国家也置于考察范围，可能会使我们得出与其说日本毋宁说美国和英国是例外的结论。也许只有在相当富裕、

政治变动很少的那些国家，协调的和自动调节的经济体制的假定才可能被广泛接受。

战后日本社会政治制度的重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的迅速增长，为新古典派的经济思想在日本的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即使如此，新古典主义仍未能达到像在英语圈的许多国家已达到的那种压倒优势的地位。相反，日本的经济学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现代”经济学，受到新古典派与凯恩斯理论综合经济学很大的影响；另一派是比较孤立、面向国内的马克思经济学。不过经济学在这两个方向上发展也有某些好处。虽然具有能够将这两种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加以整合的学识的经济学家人数很少，但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日本可能还要多一些，也正是这些经济学者常常能接受最新的经济理论方法。

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前半期经济高速增长的终止，日本的经济思想与其他国家一样也进入了危机时期。这场危机对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没有理由认为日本经济学比英、美经济学将更能提供清晰明确的解决危机的方法。但是就像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由于日本特殊的经济和学术环境，现代日本经济学者对当前困扰经济理论的那些问题倒能提供许多真知灼见。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双向的思想交流有助于我们确定走出现代理论困境的方向。

在进一步探索日本经济思想的历史之前，首先必须作三点简要的说明。第一，涉及“西方”这一术语的使用。这种表述不仅在地理方位上模糊不清，而且容易造成西方不同类型的国家似乎具有文化同一性的假象。这一术语不过是“西欧和北美诸国”或“北半球的工业市场经济（不算亚洲）”这些冗长词组的一种方便的缩

写而已。因而虽然有些勉强，“西方”一词仍予保留。第二姓名是按照普通日本人的顺序来拼写的，先写姓，后写名。按日本人通常的习惯，德川时代的学者一般用名字，明治前后的学者一般用姓。第三点说明更为重要，关系到本书的研究范围。一部篇幅不长而要对 300 余年的经济思想作出概观的著作，在内容上不能不有所选择，选择就意味着删节。许多读者也许会指出个别理论家的著作在这里交代得过于简略。总的说来，我的目的是把那些其著作是日本经济思想的主流标志的学者挑选出来：这些学者不仅在当时曾引起过人们的关注，而且影响了后人。在有些情况下，我也对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争论有相似之处的经济理论或争论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如果本书所作的简短的概观能唤起人们去探索日本经济思想中某些被忽略的部分，那么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第一章 德川时代的经济思想

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时期(1603—1868)相当于经济学在欧洲作为独立的学科登场的思想动荡的年代。在两个半世纪里,虽然西方科学思想的某些领域已经被日本学者所吸收并加以普及,但是西方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之传入日本仍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日本经济日益复杂,在发展中产生了曾引起从托马斯·孟到魁奈和亚当·斯密这些欧洲经济思想家思考的一些现象,如商业的扩大、物价的波动、分工的深化等。

德川时代的经济发展产生于在文化上相对孤立的环境,因而这个时代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上尤其值得瞩目的研究对象。那么,当时经济理论的形成在多大程度上受形而上学、伦理学、哲学传统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呢?具有不同文化传统背景的思想家在面对同样的经济问题时,会提出相似的质疑和采取相似的解决方法吗?我认为本章对德川时代思想的概述表明,虽然日本学者的“经济”概念同近代经济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常常大不相同,但他们在学问上的探求则往往引导他们沿着与同时代欧洲人的探索惊人相似的途径前行。

经济环境

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是近代的产物，但在穆勒所使用的意义上经济思想是关于“财富的性质，包括生产和分配的法则”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不同社会的每个时期都存在。

公元前 5 世纪中国哲学家孔子（但可能是由其弟子汇编而成）的言行录《论语》即常涉及‘贫富’问题 公元前 3 世纪以前 墨子学派发展了价格与货币关系的理论；公元前 4 世纪《孟子》一书载有关于分工利弊的争论；^① 类似的关于经济交换、价格和价值的争论也见于公元前 4 世纪印度的考蒂尔亚（Kautilya）和苏卡拉（Sukra）^② 的议论。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其他一些问题时，也就货币的使用、公有和私人财产制度的相对优点展开过议论。^③

这些经济议论都是在分工日趋发达以及出现了复杂的商业制度、繁荣的城市和广泛使用货币的社会展开的，这就是其共同的特征。在这种社会，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与经济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丰裕和地位不再单凭军事力量和政治习俗来决定而受到诸如物价水平或某些商品的稀缺性等神秘的和非个人力量的影响。因此，关心社会秩序和正义这类问题的哲学家和官员越来越将注意力转

^① 胡寄窗：《十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经济思想》北京 外文出版社，1984 年 第 13—14、21—23 页。

^② Aiyangar K. V. Rangaswami: *Aspects of Ancient Indian Economic Thought*, Benares: Benares Hindu University, 1934 年。

^③ H. W. Spiegel: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Da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sses, 1971 年 第 14—30 页。

向这些明白无误的经济问题。

用这种历史眼光来考察，有助于解释日本德川时代经济思想的活力。德川的社会秩序原则上是相当保守的制度，第一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制定的政治制度旨在限制或抑制两个世纪前兴起的国内商业和海外贸易，同时造就一个不仅稳固而且安宁的社会。

德川制度的基础是稻米，国土被分成若干藩，藩的大小决定于稻米的年产量，中心地带为幕府将军的直辖地。藩的支配者即大名以向藩领内的农民征课的年贡米为主要收入，再把稻米分给家臣即武士作为俸禄。

人的地位在理论上被固定在武士(士)农民(农)工匠(工)商人(商) 4 种身份的某一种身份上。在这 4 种身份之外还有“贱民”即从事如屠宰牲畜等所谓‘肮脏’职业的人或因犯罪而受罚的 法外之人。身份之间的职能差异因统治阶级实际脱离了土地而尖锐脱化了。以前，统治阶级有自己的采邑，役使本地的农民来经营农业。但在德川时代，统治阶级已迁往城下町，征收年贡米事实上成了他们与农业联系的唯一纽带。然而农业仍被认为是国民财富的基础。在身份制中，商人的地位低正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观点，认为商业活动与其说是生产性的，不如说是寄生性的。

说到海外贸易，由于与传教活动和外国的政治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德川幕府一直将海外贸易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与日本已建立商业贸易关系的葡萄牙和其他西方人在锁国政策下遭到排斥，17 世纪 30 年代以后，唯一许可的国外贸易的渠道是在长崎的出岛和荷兰进行的小规模贸易活动以及以琉球为中介的中国贸易，琉球王国与中国和日本萨摩藩维持着松弛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但是矛盾的是，德川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本身固然为经济发展

提供了条件，但这种发展最终却侵蚀了制度结构本身。虽然区域性的农民起义频繁，尤其在德川时代的后半期，但与德川以前和明治以后的时代相比，德川时代堪称是和平的时代。长期持续的和平有助于国内贸易网的扩展和新市场的建立，而这些发展又导致农村生活发生了缓慢而重大的变化。农民渐渐能购买肥料和薪柴，这些物品以前都是自给的。商业的发达不仅使商品交换兴盛，而且促进了新的知识和技术的交流。同时代优良的农业技术广泛传播，结果增加了产量。同时，货币经济的发展促使农民去从事适应本地区的土壤气候条件的农作物专门化生产。^①

交换经济扩大的最显著的特征也许就是都市的成长。幕府时代的都城江户（所有大名都有义务在那里保留一处邸宅，一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必须在那里度过）大约有人口 140 万，在 18 世纪后半期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同一时期大阪和京都的人口超过了 30 万。^② 由于财富集中于住在都市的统治阶级的手中，从而创造了对非农业产品和服务的广泛需求，如服装、家具、建筑服务、批发和零售贸易、旅店、剧场。都市成长的经济和社会的后果直接影响了德川时代的经济思想家的个人经验。如哲学家荻生徂徕就首都地价的上涨留下了以下回忆：“我的祖父在伊势有一块耕地，一直由先祖世代耕作。祖父把它卖了，而后在江户只用 50 两便购置了一处住所。我记得在我父亲那一辈，这处住所竟卖了 2000 两。”^③

① T. C. Smith: *The Agraria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年 第 6—7 章。

② 矢崎武夫: *Social Change and the City in Japan* (trans. David Swain), Tokyo: Japer Publications, 1968 年 第 134 页。

③ 荻生徂徕:《政谈》,《日本思想大系》第 36 卷 岩波书店,1973 年 第 327 页。

物价的变动如这种场合的地价上升是由供求力量还是由货币量的变化所引起是德川时代经济争论的一个焦点。与中世纪的欧洲一样，货币使用量的增加加之行政当局对货币问题一般缺乏理解，结果引起了多次通货危机。日本的货币制度十分复杂使这种状况更难应付。不仅金币、银币、铜币同时并存，一齐流通还辅之以商人发行的票据和只能在各个藩内使用的不兑换纸币（藩札）。

农业和手工业的扩大、每个地域的特产的开发、都市的兴起经济的货币化、物价的变动等必然会引起支持德川时代社会稳定性的意识形态与经济世界的现实发生冲突。制度上僵固的社会等级秩序正让位于更富于流动性的秩序，当时的文学艺术形象地把握了这一变迁。17世纪后期作家井原西鹤在《日本永代藏》中描述如下：

“一般说来 大阪的富人并不是代代相续的。富人常常是那些原本地位低下 叫什么吉藏、三助之类的店员伙计。他们在社会上地位迅速上升 变得殷实富有。渐渐地 当机遇来临时 他们自然也学会了诗词韵律、球技、射箭、操琴、吹笛、击鼓 以及焚香求拜，品茗茶道。随着与上流人士的接触，他们也逐渐摒弃了粗俗的谈吐。在实际生活中 重要的不是血胤的显贵而是后天的造化。无用的贵族之后靠兜售自制纸花谋生也是时有所闻的。”^①

德川时代的经济争论往往与关于崩离析的旧社会秩序的议论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当然，当时哲学家提出的形成对照的

^① 井原西鹤：*The Japanese Family Storehouse* (trans. G. W. Sarg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年 第 23—24 页。

看法常常反映了他们各自在社会等级秩序中的地位。但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经济社会的变迁迫使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不得不面对诸如维持身份制度的经济基础、财富分配发生变化的原因一类问题。这样，哲学探索的边界随着经济问题的增加而扩大了。托马斯·库恩在他分析科学革命的著作中指出，“发现开始于对异常性的认识”。^① 德川时代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在形式上的僵固性与实质上的流动性这种异常现象导致了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等许多领域的探索与创新。

儒学的遗产

德川时代的经济思想虽然对哲学传统的某些方面越来越提出质疑，但从未完全摆脱那种传统的影响。因此，如果对经济思想的哲学根基尤其是儒学这一最重要的根基没有某些知识，便不可能理解对经济问题的新的想法。霍华德·史密斯对孔子学说的核心作了以下阐释：

“个人的目标是完善人格个性以达到理想人物即圣人的境界；另一方面，社会的目标是在圣人的治理下维持普遍的秩序与协调。”^②

虽然对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侧重随着儒学各学派的盛衰而有变化，但对“普遍的秩序与协调”的关心表明儒学从未完全脱离过现实的政治问题，（就像我们已知的）并为经济思想作出了最早

^①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年 第 52 页。

^② D. Howard Smith: *Confucius*, London: Paladin, 1974 年 第 62 页。

的重要贡献。因此，日本思想家试图探寻用以思考同时代的经济问题的专门用语时，儒学传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值得一提的是，儒学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历史学家大都忽视了这一点。尤其是法国的重农学派是在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达到鼎盛时形成自己的思想的。例如，重农学派关于国家的概念便受到儒学的“理”的影响，“理”是万物和一切社会制度内在的法则或自然秩序。从儒学的世界观看，最严格地符合“理”的国家便是理想的国家。或者如阿贝·鲍迪尤所论述：

“行使最高权力的单一的最高意志，严格地说，根本不是人的意志。它只是自然的声音——天神的意志。中国人是唯一的其哲学似乎把握了这一最高真理的国民。他们称其帝王为天子。”^①

自然协调和自动调节的秩序——统治者为其象征但不妨碍它——的思想经由魁奈同时代人尊称他为“欧洲的孔子”而传至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因此，18世纪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思想有时出现相似之点就不仅仅是纯粹的巧合了。

在德川时代前期，居于主导地位儒学是朱子学派，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和伦理的思想体系，并不注重儒学古典著作的研究，而是看重为展示内在于每个个体之中的“理”而进行的训练和冥想。^②但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期，朱子学受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挑战。一方面，出现了像荻生徂徕和新井白石一类致力于

^① Charles Gide and Charles Rist: *A 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s from the Time of the Physiocrats to the Present Day* (trans. R. Richards), Boston: D. C. Heath, 1913年,第36页。

^② 丸山真男: *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okugawa Japan* (trans. M. Hane), 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74年,第2章。

古典的研究和对现实政治问题应用的儒学者；另一方面，国学开始主张《古事记》、《日本书记》等日本固有的神道古典的优越性而通过在长崎从事贸易的荷兰商人传入的兰学，则开始传布数学、制图法、解剖学、天文学等西方的学问。

德川时代后期，朱子学派的主导地位虽然有所削弱，但儒学的基本思想甚至到德川时代末期及明治时代依然为经济思想提供框架，尤其是经济学的概念本身也受到儒学的影响。Economy 的译名“经济”这个术语早在德川时代就已存在，但其含义与 20 世纪的经济学已作为有效配置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资源的科学的含义相距甚远。

“经济”是“经国济民”或“经世济民”的略语，其本意为“治理国家和救民于疾苦”。太宰春台在 1729 年出版的《经济录》的开头对“经济”这个用语的语源作了以下考察：

“所谓经济，即为治理天下的国家，其意为经世济民。经为经纶。……所谓经纶是指治丝而言。布的纵线为经，横线为纬。女工制作绢布，先铺设经线，后编织纬线。经也为经营之经。……营造宫室，先须制定全盘规划，而后实施，此即为经。济为济度之意，也可读作渡，字面意为将某人渡过河到达对岸。……也有救济之意，可读作拯救，意为解除人们的疾苦。也可释为完成，即所谓功成事遂。总之，经济一词有多种解释，但根本的一点是管理事务，使之成功。”^①

换言之，“经济”的思想起源于有德者作出示范的儒学的社会伦理世界。与此不同，欧洲的经济学是在牛顿的物理学的影

^① 太宰春台：《经济录》，《日本思想大系》第 37 卷 岩波书店，1972 年。

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客观的科学的。儒学所说的“经济”是一种与正义、法律、道德等问题不可分开地结合在一起的哲学体系。与这一传统完全一致 太宰春台的《经济录》应当包含罪罚、地理、教育等非经济领域，因为这些非经济问题也是“经济”的必要部分。同样对当时担任最高经济顾问的新井白石来说，他为货币改铸和贸易政策所作的贡献与他为将军进讲儒学没有什么区别。所有这些工作同样都与经济有关，都是为了使国家的社会结构稳固。

“经济”所具有的伦理和政治的内涵终德川之世基本上没有变化，但各个思想家认为对协调的经济秩序十分重要的那些问题，随着日本社会本身的发展却发生了变化。我不打算对德川时代出现的所有经济思想巨细无遗地作出解释，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少数主要的思想家身上，因为他们的著作清楚地反映了日本思想变化的主流。

农业为经济之本：熊泽蕃山(1619—1691)

在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理论与现实发生扞格的变化的社会 哲学家可能采取的立场有两种：一种是主张社会应当服从于现存的理论，另一种则试图修正理论以包容新的现实。熊泽蕃山是采取前一种立场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保守的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他看作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支持者，恰恰相反 他对社会的激烈批评使他受到幕府将军很深的猜疑 其主要著作《大学或问》被禁止销售。

蕃山的社会批判来自于他对农民与下级武士，尤其是后者的贫困的深切关心，这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随着德川政治体制的

确立，在上一个世纪的政治混乱期以武士为生计的人当中因大名采取的破产政策而主家败落、丧失职业的人显著增加。其后虽有些武士被将军和大名用来充任顾问、官吏、教师，但多数武士则沦为浪人，生活很不安定。由于武士脱离了土地，浪人不能依靠农业为生，再加上德川的身份制度严禁武士经商，因而他们往往没有合法的收入来源。

熊泽蕃山于 1619 年出生在一个浪人家庭，16 岁时在冈山藩主家谋得一份小差事，但 4 年后因尚不大清楚的理由辞去了差事回到家中。随后的几年间，他历经了贫困。有一年闹饥荒（他后来回忆道）：“我抱住了母亲和弟妹，似乎要饿死了”。^①在这种前途无望的环境里，蕃山潜心于儒学的研究，尤其受到阳明学的强烈影响。阳明学是儒学中重视心的主体性的异端学派。不过蕃山自己的著作则明显有折衷倾向，常将王阳明思想与正统朱子学和佛教结合起来。晚年的 20 年冈山藩主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职位，使他免去了冻馁之苦。他在任职的 10 年间，接触到了统治带来的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1657 年引退后，他周游各地，以一介学者度过了自己的余生。他的主要著作都作于晚年。这些作品以对当时日本人生活的逼真观察，汇集了作者对伦理、宗教、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②

奢侈与贫困这两个主题，像两条反差鲜明又彼此纠结的线贯穿熊泽蕃山的所有经济著作。富裕的城镇“不以善人为宝，而以器

^① 熊泽蕃山：《集义外书》，《日本的名著》第 11 卷，中央公论社，1976 年，第 386 页。

^② 伊东多三郎：《藤树·蕃山的学问和思想》（解说），《日本的名著》第 11 卷，中央公论社，1976 年。